

当代中国军事学资深学者学术精品丛书

董文先 著

号声

HAO SHENG YANG KONG JUN



扬空军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当代中国军事学资深学者学术精品丛书

号声

HAO SHENG YANG KONG JUN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扬空军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董文先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号声扬空军/董文先著.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6. 8

(当代中国军事学资深学者学术精品丛书)

ISBN 7-5065-5200-0/E·2235

I. 号… II. 董… III. 空军-军事理论-中国-文集
IV. E27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76117 号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北京国防印刷厂印刷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

2007 年 1 月第一版 2007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A5 印张: 12.125

字数: 305 千字 印数: 5000 册

定价: 27.00 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共收入作者精选的文章31篇，分为五大类：党的三代领导核心空军思想探要、评析以杜黑理论为代表的世界先期空军军事理论遗产、探讨空军战略思想、探讨空军现代模式和中国特色、评析高技术局部战争中空中领域作战的经验教训。多年参谋工作和理论研究工作相结合的经历，使他的文章具有很强的时代针对性，内容的扎实丰富性，较准确的前瞻性，理论观点新颖引人，材料论述严谨生动，语言逻辑性强、说服力强，是当代中国空军理论研究中一部很有特色的代表作。

当代中国军事学资深学者学术精品丛书

■论战略

●李际均 著

■徜徉兵学长河

●吴如嵩 著

■论大战略和世界战争史

●吴春秋 著

■论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基石

●鲍世修 著

■战争与战略理论探研

●虞振玉 著

■大谋略与新军事变革

●李炳彦 著

■军事思想与现代战役研究

●王厚卿 著

■中国军事战略问题研究

●彭光谦 著

■号声扬空军

●董文先 著



作者简介

董文先，男，汉族，中国共产党党员，原空军司令部军事研究员，空军军事理论研究专家组成员，空军军事理论创新成果评估委员会委员，1988年授予空军大校军衔。1938年3月出生于河南省原阳县，1954年7月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预备学校毕业后，因身体原因未能进入飞行人员行列，被选调空军指挥参谋院校学习，数年后

作者简介

进修相同专业。从1957年之后,先后任空军歼击航空兵团、师司令部作战训练参谋,师作战训练科副科长,沈阳大军区司令部作战部参谋,空军独立侦察团参谋长,空军司令部情报部侦察处长。从1985年开始专职军事理论和军事工作研究,先后任空军指挥学院研究部战役研究员和空军司令部军事工作研究员,1993年底退休。个人发表著作和学术文章约200万字,主要著作有《杜黑理论与空军》、《航空侦察概论》、《现代空军论》、《世界新军事革命初期的空军》、《现代空军论(续编)》。个人学术成果多次获空军学术一等奖,参加课题获全军军事学术一、二等奖,两次被空军评为空军军事理论研究突出贡献的优秀人员。

号声扬空军

当代中国军事学资深学者学术精品丛书

出版说明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现代军事科学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 20 世纪后二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代，产生的邓小平军事理论，更有不可估量的巨大意义。在这一历史时期，军事科学的学科化、正规化建设，也是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学科化是军事学术分类、系统、继承、发展、交流的前提条件之一。中国军事科学在这个历史期间确定了八个一级学科、十九个二级学科的学科体系。进入 21 世纪，我军军事学科体系经中央军委有关部门批准，又进行了调查充实，拓展了军事科学研究的领域。这为军事科学研究、教育创

造了极好的发展途径，也为中国军事科学界与世界各国军事科学界的学术衔接、沟通、交流提供了方便。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军事科学的研究者。他们是中国军事科学学科化的开拓者与代表人物。他们长年累月在某一学科领域的探索 and 追求，在不同时期发表的有影响力的文章，构成了当代中国军事科学中最亮丽、最鲜艳、最值得展现在历史花坛上的风景。因为这些成果不仅仅是属于他们个人的，而且是属于整个中国军事科学界的。将这些代表新中国军事科学学术发展的“扛鼎之作”、“经典之作”结集出版，是中国军事科学界建筑“学术纪念碑”式的工程，对当代及后代将大有裨益。为此，我社出版了《当代中国军事学资深学者学术精品》丛书。

这套丛书将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代表性。即选择当代中国军事学最具有代表性的学者，选取他们最具有代表性的文章结集出版。二是开放性。即丛书不是一并出齐，而是根据情况陆续选择作者，接连不断地出版，最终构成新中国军事学的“鸿篇巨著”。

祈盼军事学界的同仁能鼎力相助，多提意见，帮助我们出好此丛书。也希望丛书能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自序

自序颇好，可以说实话。

(一)

我称不上学者，更称不上资深学者。

把我列入当代资深军事学者行列，愧不敢当，诚惶诚恐。我的军事文选入军事学术精品丛书之围，是历史运气。原因很简单，我很难撑得起来。我有三个弱项：一是学术研究时间短。“出家”时已近知天命之年，老朽难雕，面壁修道时间又短，难成正果。和许多学术大家一生研著或传道授业解惑相比，差距甚大。二是没有学术职称，既无“资”，更无“深”。我任研究员是行政职务，若充以学衔，则成为“学术3·15”打假对象。三是学术成果水平低。在军事学大千世界里，我读书寥寥，如枫林采叶。即

使是在空军军事学领域，也是知之皮毛。解放军出版社精心筹划和已经出版的学术大师们的著作，全局在握，立意高远，睿智惟宰，属阳春白雪之经典。我的拙作，底蕴浅薄，视角局限，难及真谛，属下里巴人，是这套特色学术大餐中的麻辣小菜。我曾多次聆听许多学者的高论和指教，也经常拜读他们的大作，岂敢比肩。

我有点黄牛痴情，套在何处都是埋头拉车，猛然抬头，征程尽头。所以军人经历简单：军校近4年、大军区作战参谋4年半合计8年，空军团、师参谋和副科长8年，独立团参谋长8年，侦察处长8年，研究员8年，五八共40年。当然，脱军衣后又干了12年。经历说明，我是个实际工作者，终生参谋。如果说学术研究还有一点成绩的话，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当然，多级司令部参谋工作经历，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不无好处。

我从事学术研究的基础，源于军校和工作实践中自学。空军预科学校毕业后，1956年初我被选调空军指挥员训练班学习指挥参谋业务，这所当时空军的最高学府，在苏联空军顾问团帮助下，设置的技术、战役战术课程和指挥参谋专业，内容较为全面。以后再进军校学习相同专业。虽然人们戏称我是“万金油”参谋，但都派上用场。军校学的是核条件下作战，到部队后参加的第一次实兵战术演习，就是机场蘑菇状烟云笼罩下的航空兵团战斗活动。以后又入闽实战锻炼，参加撰写与当面之敌机群空战及打“斗牛士”导弹的战术材料。在任大军区作战参谋期间，给了我广泛接触战区陆、海、空三军各种类型部队和熟悉战区战役多种形式作战的极好机会。我负责承办战区反空中侦察作战、高炮部队出境轮战和与两个友邻国家防空协定方面的业务，经受了战区司令部参谋业务锻炼，受到战区首长果断指挥风格和陆军优良传统作风的熏陶，增强了战区意识和战略性合同战役意识。在任空军独立团参谋长时期，正值全军进行大规模反侵略战争准备，我组织计划和参与指挥本部队赴战区各个战役方向进行模拟训练、海上训练、新装备试飞试用训练、长途拉练，频繁参加大军区、军区空军、各陆军军进行的多种战役战术演习，为各种类型的陆军部

队讲解空军知识，并多次组织指挥部队进入紧急战备和打敌空飘气球战斗。这些活动，拓展了我的战略战役视野，也使我对空军部队的作战、建设的特点、规律有了更多的认识。在任空军侦察处长时期，我军处于持续多年边境作战的历史周期，地面军队经常紧迫需要空军的航空侦察情报，这给了我长期实战锻炼的机会和在业务领域开拓进取、探讨空军学术的巨大空间。在首长支持下，我和有关同志对空军侦察部队的作战、训练、装备、战术多方面改革；自编自教组织空军侦察干部业务集训班；多次奉空军首长之命赴前线协助军区空军组织计划和指挥边境航空侦察，向大军区和空军首长以及总部机关汇报侦察情况，并撰写《航空侦察概论》，作为空军部队、院校的侦察参考教材。这段经历，使我对空军作为一个军种的全貌、使命任务和战略、战役运用有了一定的了解，体味了空军作战和建设的一些特点和规律，增强了外军意识、战略意识和科技强军意识，对以后研究空军理论多有帮助。

(二)

我学术研究的学科多局限于空军范畴。

我的学术研究活动，大体上围绕四个方面进行：一是参加起草空军全局性文件；二是参加空军重大理论课题；三是参加全军性学术讨论会；四是评析世界新军事革命和高技术局部战争。此外，也有文章是事件所激，有感而发。见之于个人发表的学术成果，主要内容有：

一是，党的三代领导核心空军思想探要。空军是后起的军种。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空军发展建设和战略运用深谋远虑，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做过一系列决策和指示，也颇多理论阐述。他们的空军思想是我党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空军的指导方针，我尝试着对其精髓进行梳理、研究和理论探讨。

二是，评析以杜黑理论为代表的世界先期空军军事理论遗产。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意大利将军朱里奥·杜黑的以《制空权》为代表作的军事理论曾广泛传播。同时期的空军理论家兼空军统帅，还有英国空军元帅休·特伦查德和美国将军威廉·米切尔，他们都闻名遐迩。其中，杜黑理论系统完整，世人多以杜黑作为那个时期空军理论界的代表。但在我国，对杜黑及其理论长期存在误区，对其批判多有不适之词，对我军建设和作战带来不利影响。我曾以较多精力研究有关材料，以期还杜黑及其理论以真实面目。

三是，探讨空军战略思想。在我军，“空军战略”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学术概念。在空军战略研究中，一个个理论难题挡在面前。我作为空军战略课题研究组的成员，从多角度、多方面尝试着探讨了空军战略及其理论问题。

四是，探讨空军现代模式和中国特色。世界空军在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其相对稳定的模式。但我国不能照搬外军经验。为探索我国空军发展目标和建设道路，我跟踪研究了空军的现代模式和中国特色。

五是，评析高技术局部战争中空天领域作战的经验教训。海湾战争以来的世界高技术局部战争，空中作战都是主要组成部分。而今日之空中战争与传统概念差异甚大，本质上是初级阶段的空天战争，经验教训丰富鲜活。我跟踪研究其基本特点和规律，以期将其经验教训为我所用。

我从约200万字的现有著作中选了31篇文章，个别地方作了文字修改，分为上述5个部分，形成本书。由于主线是高扬现代空军思想，为我国空军发展建设摇旗呐喊，故取名《号声扬空军》。鉴于个人知识和实践局限，可能有不少错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教。

(三)

历史给了我学术研究的机会和条件。

我从学术晚苗得到成长，是社会历史条件造就的，是军队学术沃土培育的。

一是，党的正确方针使我有机会进入军事科学研究的百花园。

我的观点，有一些悖于传统理论，有学术叛逆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方针，带来了全党全军思想大解放，形成百家争鸣的宽松氛围和改革创新、开拓进取的广阔空间。研究人员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进入如鱼得水、春风得意之境，能够放开手脚探讨新问题，提出新概念，否定旧思想，得出新结论。我赶上了好时候。

二是，党的三代领导核心的空军思想使我保持研究的正确方向。

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敏锐洞察世界军事发展大势，高瞻远瞩进行军事变革，对加速空军发展建设做出英明决策。建国初期，我国处于多事之秋，空军和制空权问题成为制约战略决策的关键性因素。毛泽东多次指示，要建设强大的人民空军。20世纪80年代，全党全军面临“三大任务”压力，邓小平做出今后作战“空军第一”的论断。江泽民基于信息化战争特点，要求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攻防兼备的人民空军。党的三代领导核心的空军思想，使世界空军军事理论和高技术局部战争经验中国化，把我军作战思想推进到崭新阶段，这引导我对空军问题思维逐步进入军事学术大殿的深层部位，增强了理论勇气和信心。

三是，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兴起和复杂多变的形势推出了回答不完的课题。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世界新军事革命迅猛发展，战争形态根本变化。华约解体，战略形势和格局质变。《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实行，国家安全、权益空间范围大大扩展。反对“台独”、统一祖国的任务日益突出。这决定了我军战略方向、战略任务、战场空间、战争方式根本变化，积极防御战略内容需进行必要的调整，并要求中国空军回答：在新的军事战略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如何与威胁我国的空天力量战略抗衡，空军将要打什么样的仗，在什么地方打仗，需要建设成什么样的空军，等等。这就要求空军指战员

在空军理念、空中战争理念、空军战略、空军发展战略等方面确立一系列新的思想。

形势和任务提出需求，实践呼唤和催生理论。我被一些问题天天搅得头昏脑涨，不得偷闲。站在天涯海角眺望南海暂失的岛礁和海洋权益，我慨叹空军鞭长莫及；坐在厦门沙滩凝视海峡的滚滚波涛，我沉思夺取制空权的特殊重要性与艰难；巡游三峡大坝，我蒙太奇般地听到朝鲜战争中呼啸而下的炸弹落在了水丰发电站的堤坝上；漫步江浙海边，我仿佛看到西太平洋的剑拔弩张和第二岛链上那个装着高技术妖魔的现代潘多拉盒子，脑海中自编自演着未来东海大陆架空中战役的电影……忧国忧军之情和空军危机感，使我有层出不穷的问题在脑际萦绕。别人戏说我是“小人物想大事”。说“小人物”属实，说“想大事”不敢当。不过我确实做不完空军梦和朦胧篇，正是梦中的、现实的问题，为我的理论研究显现出数不清的突破口和契机。

四是，军队的学术沃土培育我成长。

社会发展进程和环境对人的成长和事业具有决定性意义。我的学术研究是在社会进步的历史阶段和顺境中进行的。

给了我研究机会。空军首长先后让我参加第一本《空军战役学》撰写、第一次空军战略研究，以及空军发展建设规划、21世纪初期的中国空军、空军转型、空天一体、空军司令员在国防大学和世界空军论坛演讲等课题的学术研究，还多次为领导者起草讲话和学术文章。“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我向首长和周围同志学习，受益匪浅。第一次战略研究，首长让我担任课题领导小组之下的研究组的副组长，协助组长、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勤奋博学的阮克庠教授工作，和军内外学者多次切磋。当空军战略鉴定通过后，又指定阮副院长和我分别在空军军以上机关、院校巡回讲课。在其他空军重大课题研究中，我曾在空军军事理论专家组组长、国家多个名牌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朱荣昌研究员领导下工作，他学识渊博，善于集思广益，通常都让我做所谓“开路先锋”起草第一稿，我也甘作引玉之砖和

学术靶子。空军首长多次指派我参加全军性的学术讨论会，总部机关、军事科学院和国防大学的一些部门以及空军机关、空军指挥学院，多次批准我或约我参加学术讨论会、报告会，给我以充分阐述学术见解的机会。具有学术胆识的《空军军事学术》等报刊则经常对我的文章开绿灯。机会对任何人都是重要的，是首长和同志们给了我机会。

给了我学术民主。空军首长在组织研究空军重大军事理论课题时，总是充分发扬民主，从不以行政命令匆忙结论。我曾有幸先后在空军于振武司令员、刘顺尧司令员、郑申使参谋长、何为荣参谋长领导的课题组工作。他们在学术问题上都有令人敬佩的远见卓识、积极慎重态度和平等交流的风格，让每个人都充分阐述自己的看法。刘司令员先后亲自领导多个重大理论课题的研究。他常讲，不能谁官大谁说了算，要尊重科学，服从真理。他曾多次个别征求我对一些学术问题的看法，也曾提醒我要研究各方面意见。一次在有军内外军事理论专家参加的讨论会上点着我的名说：“你要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也要敢于否定自己的意见。不是说你说的不对，要拓宽思路。”首长们这种在军事学术上平等待人、坦率交流的态度，使我深受教育，也给我以鼓舞和动力。

给了我精神鼓励。我是在首长和同志们鼓励中成长的。在空军指挥学院当研究员时，研究部部长朱奕宝将军决定向空军首长呈送研究员个人名义的研究报告，并从我的一篇研究报告开始。对于我上送的多篇研究报告，朱部长都是连标点符号都要细加审修。我研究杜黑理论时，图书馆的同志每一次都破例允许我成摞地抱材料回办公室阅读。在学院学术成果交流会上，数百名教员、研究员投票将我的成果评为十佳成果奖前列。空军主管装备和军事理论工作的副司令员林虎中将多次在我的研究报告和其他材料上批示，理论上有深度，有重要参考价值，要有关部门注意。在空司当研究员及退休后继续工作期间，空军首长聘任我为空军军事理论研究专家组成员，两次评我为空军有突出贡献的优秀研究人员。空军学术单位对我也鼓励有加。空军

指挥学院院长张希光将军主编的名著《21 世纪的防空革命》，称我为“中国空军军事理论家”。《中国空军》杂志年轻有为的编辑王健云的《中国军事专家访谈录》一书中，把别人戏称我为“中国的杜黑”的绰号也写进书中，有的学术同仁更玩笑地叫我“董黑”。对于首长和同志们的夸奖与玩笑之词，我当然不当真，但这却给了我巨大压力和动力，使我在学术研究中不敢稍有懈怠。

(四)

困难和挫折磨练了我“认真”的学术性格。

我不在长的学术探索道路上，遇到过挫折，也得到磨练。我坚持事业为重，虚心学习，与时俱进，追求真理。在学术风格上认真求实，做正直人。

一是不要怕挫折。学术发展史说明，个人有很大局限性，学术活动又常常涉及人事关系，很难一帆风顺，甚至可能遭到责难。我有过这样的经历。我曾为在一份重要的文件中坚持以一个准确的学术概念代替不准确的学术概念，多次向领导陈述建议，有的领导曾以挖苦性语气说我：“空军机关像你这样‘认真’的人恐怕是没有了”。也有的同志说我“书生气十足”。对于这种境遇，我十分冷静，以平静心态对待。我认为，要以事业为重，在学术上不能沽名钓誉。任何人都不能说假话，研究员更应做正直人，必须实话说。

二是不要怕“喝水”。学术研究是向新知进军，个人提出新的学术观点，通常属原创性，很难无懈可击；即使是正确的，开始也常会引起争论。这时就像扁舟飘流大海和江河逆浪游泳一样，存在翻船和“喝水”的危险。要有这个思想准备。20 世纪 80 年代，《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外层空间军事化不断发展，反“台独”任务突出。它客观上要求空军的战略活动空间范围发生相应变化。于是我在 1987 年开始撰写《论战略空疆》研究报告，提出了“战略空疆”概